

六盘山下三百红军牺牲之谜



今日六盘山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国民党何柱国骑兵军第7师19团展开了激战。毛泽东果断地对林彪和左权说：“吃掉它！”林彪、左权遂指挥一纵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不到一个时辰即告大捷，毙敌200余人，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150多匹。由此装备了一个侦察连，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战斗结束，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一座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可就在第二天黎明，毛泽东被紧急送来的一份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夜间发生了一起红军命案，驻扎在镇外宿营地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称，三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如此集体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号人，这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从江西出发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剩下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毛泽东扼腕顿足，无比愤怒，令保卫局即速查办谋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

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大都认为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投毒所致。可敌人在哪儿？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人员进行审讯，但案情没有丝毫进展。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桩

命案，派专人又返回耿湾镇对此案再次进行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线索。

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在后来得传遍神州，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一直未破，被尘封在共和国的历史档案中，成了许多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团。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的诗句，讲起长征最后

到达陕北的这段岁月，他总是忘不了这300多红军将士的冤魂，扼腕叹息。他曾亲自部署让周恩来负责侦破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却无论怎样也与此案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成为悬案。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急，国民党毛炳文部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奉蒋介石急令猛扑过来追剿红军，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为死难的红军将士举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草安葬亡灵后，当即就率领人马向东急进，于10月16日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

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就近日陕甘支队的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彭德怀接到电文，遂命令后勤部长杨立三把好吃食关，不准部队随便喝生水吃生食，违令者严肃处理。彭德怀在后来写的自述中谈及此案依然心痛难忍：300多号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都没有倒下，却在长征就要结束的时刻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怎不令人万分心痛！

10月19日傍晚，陕甘支队穿过黄土山谷——头道川，到达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一个小镇——吴起镇。这时“马家军”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追了上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要想办法打他们一下，砍掉这条讨厌的‘尾巴’，不能让他们一直跟到陕北，这对我们很不利。”彭德怀遂向部队下达命令，进入埋伏阵地。彭德怀作战前动员时说：“300条命不能就此白白丢掉，要让敌人加倍偿还！”经过一夜激战，这条“尾巴”终于被砍掉了。

硝烟渐渐散去，毛泽东登上马梁山山顶眺望，方圆皆是绵延的浅褐色的黄土山丘，和被雨水冲刷得干裂的沟壑，山顶上有块高大的界碑，碑的正面

刻着“分水岭”三个大字，作为甘肃、陕西两省的分界线。毛泽东看了碑阴（碑的北面）文字，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

时光匆匆流过了50多年，此案终于被破解是在1989年秋天。兰州军区驻宁夏的某部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勘探调查，在与当地政府有关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在六盘山下发生的这桩多年未破的奇怪命案。

给水团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等了解了这一悬案后，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受职业的敏感与促使，他们决定揭开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命案之谜。他们翻山越岭，踏遍了六盘山麓的千沟万壑，在走访当地老百姓时听一些老人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下来打了一仗后，一部分人马沿罗家川、马坊川等沟谷川道来到了耿湾镇。当时天色已晚，队伍里很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里找泉水喝。可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这地上躺倒了一片一片的人，再也没有醒来。”

了解了这一情景后，给水团的官兵们心情十分沉重。他们根据已掌握的当地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勘察及采水样分析，甚是震惊地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涩，水中钾离子含量高得惊人，一吨水中纯钾含量高达2至3公斤。而正常情况下，一吨水纯钾含量只有300至500克。同时又发现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且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呈间歇状冒出来，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这表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发育活跃，这些气泡从油层冒出，就很可能带有大量氡气。而氡气与钾结合就生成氰化钾，与钠结合便生成氰化钠，这是两种剧毒化合物，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当年300多名红军是否与饮用了含有这两种剧毒性的水而死亡有关系呢？

整整3年时间，给水团工程师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采样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死，而没来得及下沟喝水或到了宿营地吃饭喝水另外的红军们就躲过了这一劫。检测结果由兰州军区报中央军委。

六盘山下红军牺牲的悬案终于破解。是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领袖已去世十多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300多名红军将士的死因。

（摘自《解放军报》）

天安门上巨幅标语的来历

钟灵，1921年8月出生于济南，又名钟毓秀，他早在1938年7月就加入共产党。投奔延安那年，钟灵还是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后来上级让钟灵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就让他留在陕甘宁边区做文化教育工作。后来，钟灵在延安各报刊发表木刻、漫画作品多幅，并设计了“宝塔山”邮票。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当时的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开国大典前，周恩来和胡乔木决定在城门正中间的洞门上方挂一幅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两侧的城墙书写巨幅标语。由于当时国徽方案尚未通过，于是又临时决定在悬挂国徽的位置上悬挂大会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钟灵当时任政协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大会会标和两条大标语的书写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决心好好露一手。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要有房子这么大，钟灵可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刚解放，北平的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之前，钟灵先是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之后操起剪刀，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下层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捧上去两边应当是对称的。钟灵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其他的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右四间是对称的。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肯定是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这是钟灵平生第一次写这么大的美术字，他严谨而认真，用尺子和铅笔，整整写了两天的字，字体采用的是庄严、大方的宋体美术字。

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标语的字大约有二米见方，做出来比站立的一个人的头还有余。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标，上面写着大约一米多见方的17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当然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开国大典之后，会标当然撤掉了，两条标语要不要撤掉？钟灵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看了看天安门的会场设计图，最后决定：把天安门两侧的标语留着好一些，但可以把东边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周总理的决定不但包涵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也使两边的标语字数相同，设计书写时字的间距也

是一样的，完全对称，更加美观。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社会上许多繁体用字都逐渐改成了简体字，在1964年国际劳动节前夕，天安门标语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改变。但那时钟灵已离开中南海，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副秘书长之职，天安门管理处是通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余心清局长（也是国家典礼局的局长）找到他，下达了由繁体字改为规范简体字的任务。从这次改字体后，这两条大标语40多年来一直没有再改动过，当然灯箱的维修、更换就不止一次了。

天安门的这两条大标语，保存时间之长，所处地位之显要，并且被认为是宋体美术字书法的典范，这都是当初钟灵书写时始料不及的。

（摘自《党史信息报》）



1949年的开国典礼

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阅兵

西南一隅，蒋介石梦想能重演抗战8年坚守大西南的一幕。

1949年9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从台湾几经辗转飞到成都。上午11时40分，“中美”号专机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机场降落，蒋介石走下舷梯，终于再一次踏上了大陆的土地。蒋介石这次在成都停留了5天，扫墓、重大的人事安排、接见官兵、抚慰遗属、出席茶会、演说，活动一个接着一个。

9月14日，蒋介石来到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检阅。蒋介石看着台下精神饱满的6000名官佐，情绪异常亢奋。他大声地说：“国军全面反攻已指日可待，区区共匪何足畏惧。”一阵激动之后，他忽然又伤感起来：“我很伤心，伤心的是有的学生背叛了我……”接着哽咽起来。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急中生智，马上宣布：“阅兵开始！”这才解了蒋介石的围。

军校官佐的步兵方队走过来了。接着，炮兵方队轰隆隆地开过来。这时，一台加农炮车在“中正台”前停住不动了。马上，十多名卫士手提长短枪冲向炮车，几名贴身警卫靠向蒋介石的两侧。

原来，炮车开到蒋介石面前时抛锚了。一名军校少校中队长正在满头大汗地排除故障，可熄了火的炮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阅兵指挥官只好下令把这台炮车推到一边去，后面的炮车，因前面受阻，都挤到了一起。就这样，军校官佐们忙了好几天的阅兵式，不到半小时就草草收场了。

12月3日，蒋介石又向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提出要检阅黄埔军校全体师生。

检阅地点仍是军校大操场。“中正台”四周，彩旗飘飘。这天，正赶上四川的大雾天，故阅兵式的时间一推再推。蒋介石一早起来，几次抬腕看表，仰头看天，雾就是不散。直至9时半，蒋介石等不及了，遂下令阅兵开始。张群陪蒋介石登上“中正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奏起，一名军官打开一面青天白日旗，手拉绳索，在蒋介石及全体官佐的注目下，徐徐升旗杆。就在旗子升到旗杆的一半时，突然间，“啪”的一声响，紧接着，“呼啦啦”几声，旗子竟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蒋介石脑门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他呆站着，一动不动，也没有说一句话。原来，是旗绳断了。说来也怪，军校升旗升了几十年，成百上千次，从来没有断过绳，可今天偏偏就……全场的空气足足凝固了几十秒钟。这时，两名升旗官才缓过神来，以最快的速度放倒了旗杆，换了一根绳子，总算把污染了的青天白日旗升上了旗杆的顶端。

“落旗”，使蒋介石的情绪一下子落到了最低点。他仅仅用嘶哑的喉咙哽咽着说了几分钟，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阅兵式再一次不欢而散。

这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检阅黄埔学生。

（摘自《人民政协报》）